「開放社會」的人敵

蘇浩志　譯

縱然里維孫尖銳地反對許多波普所說的話，他還是很尊敬波普「對很多不同的思想領域，熟悉的程度是廣博而且精深的」。里維孫對波普以民主、自由的理想爲己任，對「開」書中所致力的目標的擔當，也深表敬仰。那些固執地認爲普氏對柏拉圖的研究，是碎屑、無價值的人，本身就是碎屑、無價值了！因爲他們沒有學理的根據，只會反覆地叫囂罷了！而眞正

入流的哲學家是不會犯這種錯誤的。羅素（Bertrand Russell）就曾寫道：「他攻擊柏拉圖，雖然有異於正統，但以我的觀點而言，是全可以辯解的。」吉伯特・賴爾（Gibert Ryle 譯按：一九〇〇生，分析哲學學派。），本身也是一位著名的柏拉圖學家，他在批閱了波普的書後於「心智」（譯按：一雜誌名）上寫道：「波普對希臘史及希臘思想的研究，無疑的是很精深而且是第一手的。柏拉圖的哲學，絕不會再有這樣的註解了。」二十五年後，賴爾特別又如是地擔保了一次。

柏拉圖的思想，以現代世界的政治、社會生活而言，並不是一個熱門的問題；在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思想，同樣地也不是。但馬克斯主義可就不同了！事實上，在實踐方面，像馬克斯那種空前的個人成就，人類史上是絕無匹敵的。（譯按：事實不然。許多人，如耶穌，影響力是在馬克斯之上的。）這一點，可以從我們的時代現狀表現出來。還不滿一百年以前，馬克斯正當五十幾歲，不過是一個以閱讀和寫作度日，跟妻子和家人住在漢普斯狄（譯按：倫敦西北部一自治區）的知識份子。當時連知識圈裏，他都不太有名氣。但在他死後七十年不到，有三分之一的人類，用他的名字來稱呼他們的社會，其中包括了蘇俄和它的附庸國，以及中國大陸，那眞是個異端；而且，我想他那種「全然地離奇」，到今日還是沒有充份地受到仔細的考評。不過很少人會否認：馬克斯是近百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；也很少人會否認：如不先了解一下馬氏政治和社會方面的思想，要想了解今日我們所生活著的世界，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而且現在情形跟二十年前有點不同了！在我們的大學校園裏，在整個西方年輕的知識份子中，對馬克斯主義有興趣的，是愈來愈多，而不是愈來愈少哩！

馬克斯主義的中心論點，是倡議「科學化」。他本人自認爲，比喻來說，是歷史、政治、經濟——事實上可以說就是「社會」——的科學上的牛頓或達爾文。他把他的書「資本論」的第二册，題獻給達爾文。「因爲他在知識上對達爾文的崇敬，超過當代的任何人。」他對達氏的崇敬，主要是繫於達氏提出『進化』與『天擇』的觀念後，在自然科學領域裏所造成的影響。這種影響，正是他想在人文歷史上，奮力掀起的。達爾文很快地抑制了這種捧場，他寫了一封有禮

、措辭謹愼的信給馬克斯，說他很遺憾自己在經濟科學上並無所知。但達氏還是在信末祝願——願人類的智慧得以增進——他假定這是他們兩人一致的目標。」（按：以賽亞・柏林的書，「卡爾・馬克斯」，一九六三年，紐約版，第二三二頁。）

問題的要點在，馬克斯相信，人類社會的發展，受他所發現的科學法則所控制，他的科學概念，不可避免地是「先愛因斯坦」的。就像那個時代裏每個略有見聞的人一樣，他想牛頓已經發明了自然律。自然律控制著所有空間中物質的運動，只要把物理上有關的「數據」「送進去」，我們就可預知一件事未來的情況。就像我們可以預測日出、日落、日蝕、潮汐的轉換等一樣。無論如何，雖然我們憑藉自然律，可以預言我們太陽系的未來，但我們不能靠它去控制這些變化。這些變化，可以說，是根據必然的鐵則，朝着不可避免的終極結果去發展的。對這種終極結果，我們誠然可以預期，並加以形容，但就是無法改變它。馬克斯自以爲他的發現和牛頓的發現是完全平行的。爲了要渲染這種平行，他故意襲用許多牛頓的用詞。在「資本論」裏，他描述他已經發現了「資本生產的自然律」，他並警告：「就算一個社會已經進入正軌，去追尋自己演進的自然律——這個追尋的最終目標，乃在暴露現代社會進化時的經濟法則——那些由『正常發展』而衍生出來的一連串『局面』，其所帶來的障礙，絕不是勇猛地一躍就可以超越的，也不是制定條規就可以清除。這是這些進化的法則本身的問題。它們有伴着一種必然性——必然朝不可避免的終端去發展——而運作的傾向，這種傾向，就會帶來問題。對較落後的國家而言，工業技術進步的國家，只不過展現了他們對自己的未來的『想像』而已。」

馬克斯對它認爲「不可避免的未來」，表示個人的歡迎——這件事，實在和什麼科不科學不相干。嚴格來講，他對這種事的鼓吹，不過是可以被看成和一個天文學家，在倡議他對日月蝕的預測一樣——這天文學家可能樂意看到日月蝕之發生；他期待它們，等到他們眞正來臨了，也的確顯得很高興。馬克斯老是堅持他的理論是「科學化」的——就「他只是在描敍情況，而非在做『規定』」這一意義而言的話。用「烏托邦」做比喻，他駁斥所有其他形式的社會主義：「烏托邦」說得好，只是一種主義，說不好，只是一

種觀點罷了。波普接受這樣子的區分：從一頭來講，馬克斯主義的信念就是我們無力自塑歷史的行程；而另一頭呢，烏托邦主義的信念却認爲要創造一個完美的社會，完全在於我們自己的能力——雖然「馬克斯主義」大部份被錯解成後者了，而且看起來，大多數的共產黨徒，也都這麼錯解。對這樣的黨徒，波普給他們一個稱呼：「平民式的馬克斯主義者」，而馬克斯則叫他們爲：「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信徒。」而事實的眞相呢，我想，就是社會主義是烏托邦主義，但馬克斯主義却不是；記住這兩個主義的不同，因此看來是很重要的了。

馬克斯老揚言一切要「科學的」，這使得他自己有個艱困的後局，卽他必須能用有科學水準的辯論，成功地保護自己，否則就要變成沒有一貫性了。如果他在那個水準上有一點失敗，他就無法再依靠其他的辯論型式了。簡單來講，他一定就通不過試驗，而要接受其惡果了。波普被認爲已經在科學眞理之前，摧毀了馬氏的「科學化」，並且使它沒有重建的可能。馬克斯的理論並非不可被證明爲假，「平民式的馬克斯主義」，才是不可被證明爲假。波普並沒有犯了把「平民式的馬克斯」歸屬於馬克斯氏的錯誤。馬氏的理論，在應有的知識的嚴謹態度之處理下，產生了很多不正確的預測，其中最重要的，現在都已經被證實是假的了。例如，根據他的理論，只有已經充份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，才會變成共產國家，所以，社會必須第一步完成了「資本社會」的這個開發階段。但實際上，除了捷克斯洛伐克（Czechoslovakia，譯按，由三個邦合成，主要成份是捷克斯拉夫民族。）之外，所有目前的共產國家，都不是經過工業開發的國家，沒有一個是資本主義已經全然發展了的社會。根據馬氏的理論，共產革命一定要建立在無產階級的工人身上，但是毛澤東、胡志明、費德・卡斯楚很明顯地否定了這一點，他們都靠着自己國家裏的農民，而掀起赤色革命。照同樣的講法，有充份的理由，無產的工人一定會更窮，更多，更富有階級意識以及會帶來更多的革命；事實上，自馬克斯之後的工業國家，工人更富、更少，更沒有階級意識以及並沒有帶來更多的動亂。馬克斯又說，共產主義一定是只有從勞工大衆引發出來，但實際上，今天沒有一個國家，包括智利在內，共產黨能設法在自由選擧中，贏得多數人的

支持。往往在他們的地盤裏，他們是靠着軍隊——通常還是外國軍隊——將共產主義硬塞給人民大衆。馬克斯又宣稱：因爲生產手段的緣故，資本的所有權，註定要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裏；事實呢？由於聯合股份公司的蓬勃發展，資產已經分散，而且流入到新興階級——專業化的經理人手中。這個新興階級，本身就是一個對馬克斯預言的駁斥。馬克斯主義者認爲所有其他階級，均將無法或免地消失，而極化成兩種對立的階級：一種是不工作，控制而且佔有的資本階級，他們的人數一直在收縮；另一種是一直在膨脹的無產階級，他們工作，但不控制也不佔有。

現在，我們談另外一面。馬克斯和思格斯（譯：共產主義起家人之一。）談到有關各部門科學的話，大半在各部門科學後來的發展强照下，變成餿話。例如愛因斯坦以後的物理學之於他們有關物質的理論，例如佛洛伊德以後的心理學之於他們有關個人行爲的瞭解。馬克斯主義他們的黎加圖（譯按：英國經濟學者，Ricardian Economic Foundations）式經濟學基點，本身已被凱恩斯之後的經濟學，掃進廢物堆裏；他們黑格爾式的邏輯基礎，也被傅雷格（譯按：Frege，數理哲學家，1848—1925）以後的邏輯學同樣地對待。他們對政治組織未來的發展的觀點，也和後來實際所形成的的大不相同——我想，他們主要的失敗，在於忽視了民主代議政治的成長。（這又是他們一個理論上的錯誤所致，他們的理論排斥了這樣子的發展。）

以上這些，就構成了對一個基本方法聲言爲「科學化」的理論的反駁——它的預言是通不過經驗事實的檢驗，也被發現是虛假的。不過這種檢驗，雖然是主要的，但却不是一種理論必須通過的唯一檢驗。它必須也能符各邏輯的一致性跟連貫性才行。馬克斯主義的基本教條之一，生產方式的發展，是改變歷史的唯一因素，跟事實對照，也暴露了它邏輯上並不連貫，因爲事實上沒有這樣的理論，可以解釋爲什麼生產方式會發展，而不會停留在原來的方式上。

馬克斯認爲歷史的發展，是依照科學的法則；這一個觀點，正也是波普所稱作「歷史主義」的一個例子。「我所指稱的『歷史主義』，是一種社會科學的手法，他們預設『歷史的預測』，是他們主要的目標；而在歷史的進化的依據下，他們也假設，藉着發現

『節奏』、『型態』、『法則』、『趨向』的方法，這個主要的目標，是可以達成的。」一些歷史主義的信念的例子是這樣的：就像有『選民』的派遣，而就會有舊約中的猶太人；像因「基督復臨」前大衆改變信仰乃不可避免，而產生了早期的基督徒；在羅馬要統治世界的註定命運裏，而出現了羅馬人；像由於人的完美性及進步的不可避免性，而必有啓蒙運動中的自由主義者；像因爲社會主義的必有性，而出現這麼多的社會主義者；像千年德國的建立，而定產生希特勒。你只要開出一些有名的例子，去註明這些事緩慢的「成型率」就成了。和一些特定的學說不一樣，一般的觀念裏，歷史有註定的「目的」的，就算沒有，一些藍圖，或至少一些意向，甚至一些連貫性的型態，總是會有的——這種想法，看來流傳得很廣。

如果歷史的必然性經過嚴謹的辯證，一些有限的解釋是可能的。或者它們在「外在智慧」（通常是上帝）的指揮之下，以求能和這個指揮者本身的目的相配合。或要它們是由「內在智慧」（如在內的精神，生命力，或一些本質：像「人的命運」等）所引導。或者一點也沒有所謂的「精神」存在，「歷史過程」完全是由物質的運作在決定的。前面兩者，很明顯的是形上學的領域的，它們無法被證明爲僞，但當然也不是科學的。而第三種呢？却是依賴在一種不再站得住脚的科學概念上。

波普捨棄「歷史之必然」的論點，從他其他方面的論著，就可以看清。他是個「非決定論者。」（譯按：Determinism）「決定論……認爲我們的意志行爲，是被一羣行爲動機、以及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瞬息間之心理情況所決定……」「決定論主要是植基於因果律」；擴而言之，既然材料一定、法則一定，世界發展的終極是早就被決定了。非決定論者的主張，恰好相反。）波普相信「改變」是我們企圖解決我們的問題的結果。我們解決自己問題的企圖，是和一些不可預測的東西——裏頭的「想像」、「選擇」、「運氣」有關連。對這些，我們既要「做選擇」，自然就得負其責任。截至目前爲止，不管是什麼指揮程序，事實上在推動歷史前進的，就是我們自己。是我們在與別人、自然環境（不是我們所創造）、「第三世界」（我們所創造；但個人在其內只能繼承，以及做一些輕微的改變。）的交換影響下，推動前進的。

任何歷史所形成的目的，是我們所形成的；任何它所代表的意義，也是我們所賦予的。

從這樣子的立足點出發，波普攻擊所有的歷史主義者的理論；他特別强力攻擊馬克斯主義，理由是一：它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主義；二：它是幾個主義中最重要的一個——這些個主義宣稱歷史的發展是循着科學化的法則在發生，而對這些法則（由他們自己所提供）的認識，可以使我們能預測未來。波普那極技術性的論證乃在於表現不可能有一個「科學預言家」；科學家也好，計算家也好，都不可能利用科學方法，對我們自己未來的結局，加以預測。用比較平常的語辭來說，他的論證是如下的：人類的歷史路線受人類知識的成長强烈地影響，是很容易看出的；甚至視所有的知識爲物質發展的副產品的人，也能不自我矛盾地承認這件事。但預言將來的知識，邏輯上是不可能的：如果我們能預知未來的知識，那我們現在卽已擁有它，它也不會是什麼「未來的」了，如果我們能預知未來的發明，那我們豈不是現在就已發明了它？從這一點跟着可以說：如果未來可能會有「有意義」的發現，那現在預知它就是不可能；卽使在人志之外，它的確是已被決定的了也一樣。還有另一種論證：如果未來有可能讓我們科學性地預測，它被發現一次後，就可知並非神秘，因爲本質上，它還是有可能被別人發現的。這更進一步，讓我們清楚採取推諉的態度，是可不可能。在這些邏輯的領域上，歷史主義是坍臺了。我們必須放棄這種觀念，放棄馬克斯主義——它照對應於物理的理論化，也想將歷史理論化。

隨同「歷史是可以科學地預測」的這一觀念的瓦解，「社會是已被全盤設計的了」的這一種想法，一樣地也跨掉了。這因爲這在另一方面，也呈現了邏輯上的不連貫：理由是，第一，因它無法對這個問題提出一致的答案——「誰來設計這個設計者呢？」第二，事實上顯示，我們的行動，樣樣都很可能得到出乎意表之外的結果。尤其是第二點，附帶地暴露了一般烏托邦主義者假設上的謬誤。（雖然馬克斯不曾如此——事實上，馬克斯主義者在這一點上比很多『社會民主』人士腦筋清楚得多。）烏托邦主義者，「在社會上假使有壞的、我們不喜歡的事發生——諸如戰爭、貧窮、失業——那麼，這一定是在壞的意圖，或

計謀下造出來的結果，一定是有人在故意搞鬼，當然，也一定有人從中獲利。我稱呼這種哲學假設是一種『社會暗盤』的理論。」波普在其他線上攻擊馬克斯主義，所運用的支承論證，我們此地不加以詳細解說；但他所有論證中最重要的，自然是指出馬克斯不僅在「社會」方面錯了，在「科學」方面，他也錯了；馬氏自稱爲他是在提倡「科學化的社會主義」，而波普相信，他已完全將這種學說推翻了。如果波普在科學方面的見解是正確的，那麼他的見解，才是唯一純正的科學化的政治哲學。目前存在的對「科學」的敵意以及對「理性」的反叛，兩者都受錯誤的科學及理性的概念所轄治，但它們却很明顯地並行在今日的世界上。

波普認爲除了人類自己賦給它的之外，我們對歷史一無所知。他的這種論證，已爲某些人帶來混亂，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於某種存在主義的虛無裏。另外有些人，害怕如果波普是對的，那麼所有目前的「規範」及「價值」，會都變成「專斷無據」的了。對於後面這一點，波普在「開放的社會」裏，有很好的解說：「幾乎所有的誤解，都可以回溯到一個基本的誤會上，卽，回溯到一種信念——誤以爲「慣例」就是意含着「專斷」，而且以爲只要我們如果能自由地選擇一個我們喜愛的規範體制，那麼每一個體制，都會一樣好。我們承認，當然，『規範是人造的或成於慣例的』的這一觀點，是意味了幾分專斷的意思，也就是說：雖然可能是有幾個不同的規範體制在，但在其中我們選擇的範圍並不大。（這是普洛大各拉斯曾相當强調的一件事實。）（譯按：Protagoras，主觀主義者，西元前四八〇——四一〇年。）不過『人造』絕不意含着『全然的專斷』。譬如，數學上的計算法、交響曲、戲劇，是高度人工化的，但也並不表示，計算法、交響曲、戲劇，每一個都是一樣好。」他對「爲何不然」的解釋，以及對他所相信的人類眞正的方向的解釋，都是從他『「知識的進化論」所演化出來——特別從是他的「第三世界」的說法——這些我們在其他地方已經另外討論過了。

一些波普反對馬克斯主義的論證，也應用到烏托邦主義上。他反對社會可以一次被「掃除」，然後用一個「全新」的來代替，就是一個例子。「烏托邦主義的路子可以作如下的描寫：每一個理性的行動，一

定要有一個特定的目標。它一貫地、有意識地追求目標，和它就着目標而制定手段，也都同樣地合乎理性。『去選擇一個目標』，這麼一來，就變成我們理性地幹一件事情時，第一步所必須做的事。而且，我們必須很小心地決定我們眞正、最終的目標，並很清楚地將這個目標，從中程的、局部的目標中分辨出來；因爲中程的、局部的目標，只是到達最終目標的手段或階梯而已。如果我們忽略了這個分辨，那麼我們一定也忽略了研討這些局部目標，是不是對達成最終目標可能有所幫助？忽略這件事，也就是說我們做事不合乎理性了。這個原則，假使運用到政治活動的領域的話，就是講究在有實際行動之前，要先制定我們最後的政治目標，或「理想國」了！只有我們決定了我們的最終目標，或至少大致繪出輪廓，以及我們準備照理想中的社會之藍圖前進，我們才能開始考慮用什麼最好的路線或手法，來將它實現，同時擬出實際行動的方案。」

波普反對用任何方式，在政治上以一個藍圖做起點，然後開始去把它具體化；所有的理想主義者，只要他想嚴謹地當一名「非幻想的理想主義者」，就必須面對波普的論證。他的第一個論證爲：不管要到那裏去，你只能從目前的立身處出發，沒什麼別的選擇。在政治上，比起「認識論」、科學或藝術，沒有什麼多的可能，你可以回到起跑線再出發。不同於理論，所有「眞實」的改變，只有在實際存在的環境裏才能被改變。烏托邦主義者共同地主張：在更易這個、更易那個之前，社會必須先整體地被改變。但這種講法所帶來的，等於就是在你能改變一件事之前，你必須先改變所有的事，（譯按：波普先生此地邏輯上似乎有點問題，取料自不同的體系。）這是自相矛盾的。第二個論證是：不管我們採取什麼行動，都會有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結果的，而這種結果，可能很容易就會和我們的藍圖相悖。愈是整體性的行動，愈是會有意外結果產生。爲了全盤的社會清掃計劃，而講究「理性」，就是在講究我們實在還沒有經歷過的一些細瑣的社會學知識。用烏托邦的方法來談論「手段」和「目的」，就是在用一個迷糊的暗喻：事實上的問題所在即是——事件中比較近期的，就被叫做「手段」；跟着的那個較遠期的，就被叫做「目的」。他們也仍然要被——除非歷史突然中止——更遠期的連繫

事件，所按序相繼。所以，「目的」事實上並非眞正的目的，而僅僅是在一連串無休止的組合中，一個「第二個事件」罷了，實在不必有什麼值得謹愼保障的特權。更有甚者，第一組事件比起更遠、更不確定的第二組事件，要更容易在經過熟思後的形式下，達於具體化。第二組的回報保證，是低於第一組的。如果談犧牲，而且每個人都有同等的道德申訴權的話，把第一代犧牲給第二代是不對的。

至於藍圖本身，一般人對他們需要何種社會，看法都不會一致——這是可考的事實，對傳統的保守派、自由份子、社會主義信徒，都不例外。所以不管羣體的性質爲何，要想從事於對已設計好目標的藍圖付諸行動，若不强制逼迫反對者一樣爲該目標效力，一定也得設法使得反對立場變成無效。但一個自由的社會，是不會硬派一個共同的社會目標的。因此之故，擁有「烏托邦」這一目標的政府，必定，也先天地已被限制，將變成獨裁政治。要將社會根本地改革，是一件大任務，它註定要很長很長的時間；在進行再造運動時，就定義而言，它將是個會引起改革騷動的；而特別在這段騷動的時期裏，就算不是立刻地，但整個社會的目標、構想、理想，因而有了根本的再修改，是不是很可能呢？如果眞正再修改了，意思就是在往前推進時，看來是最合需要的社會形式——對藍圖的設計者而言也是一樣——便要愈行愈遠地逸出當初的設計了。而繼續推動改革的人——他們原跟第一手的設計工作無關——更會發現接手的東西，與目標無法套合。這也和另一個論證有關：就功效而言，設計者自己不僅是他們想要踢開的社會的一部份，他們的社會經驗，甚至預設、目標，就批評眼光來看，也都受原有的社會深深地限制。所以眞正地想根除原有的社會，卽意味着也要根除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計劃。無論如何，一個社會的全部重建，因爲劇烈改革——也因爲劇烈而變得拖拉不堪——會「驅逐」及迷亂了很多人，然後導出廣泛的心理上、物質上，均很難解決的困境。我們必須預計，至少有部份人，會對有可能導出這種局面的危險的方法，加以反對。而那些想把理想社會具體化的權力所有者，一定也會認爲這種反對「至善」的人，必是基於本身的利益才反對——當然這是片面之理了。反對者將被視爲社會的敵人，不可避免的，跟着就要被犧牲掉。因爲實際上不可得

的理想目標，不會來得太早，而這段時間內，反對和批評則必須加以窒殺，此一來，進行的期間就會更拖拉，藉着最善意的理由，暴力和獨裁也就要更伸張了。就是因爲意圖跟目標，都被認爲是「理想」的，在後來者實行時一連串的失敗之後，註定要有更多的「告發」，告有些人在蓄意搖撼那一艘船——一定有陰謀破壞、外國干預、邪惡的領導——總之，爲了要扼殺對革命的批判，所有可能的惡意解釋，都會加諸在某些人身上。驗查出所有的罪犯，然從除掉他們，是必要的——而如果必定要有一些罪犯的話，那麼他們就會被製造出來。革命朝廷到現在，已是浸身在不可預知的茫茫命運中；即使革命的敵人受到懲罰，革命在施行上，也會「堅確」地走向失敗，而統治集團，此時爲了要應付緊急問題，就會一再再地急抓住即期的解決手段（波普所說的：「沒有計劃的計劃」）。而這些個手段，通常對他們前朝的政策而言，會變成是最大的蔑視。這樣子，也更會擴大他們實際所做的和他們所宣稱的差異。他們實際所做的，可笑地，愈來會愈像「非烏托邦政府」的所行所爲。

事際上的情況當然是這樣的：在任何重建的當兒，幾乎我們都要求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幾個層面，繼續發揮功能——人們必須仍然給衣給食給住給溫暖；如果小孩子沒有被强暴地犧牲掉，就該繼續受到呵護和教育；運輸、醫藥、警力、消除隊必須保持運作。在現在社會裏，這些事都要依賴一個强大的組織，一下子就踢掉它，不啻就是在製造混亂；且如果相信無論如何，這樣子（踢開原有的社會）的話，一個理想就會出現，就眞是鬼話了！而相信一個比現在好的社會，在混亂中比在目前的社會下，更容易產生，這種想法，更無異是與「瘋狂」爲鄰。總之，就算我們被命令要改——我們也絕不能，不管什麼完不完美的夢想，把一切東西一次掃開，然後再重新開始。人類就像海上一艘船隻裏的水手們，他們可以選擇他們所住的那艘船的任何一部份來改造，可以一段一段地做，但不能一次馬上就全部重新造過。

「改變是絕不會停止的」這一事實，使得「至佳社會的藍圖」這一觀念，變成荒誕無稽，因爲即使像藍圖所構繪的社會了，它也會立即地開始離開它。「理想的社會」是「不可得」的，不但正因爲他只是「理想的」，也因爲它是靜止的、固定的、不變的——

考察了所有的各種「藍圖」，都沒有例外——而在可預見的社會裏，不可能會發展出這樣的東西來。事實上，「社會改變」的步調，一年又一年，看起來是愈來愈快，而不是愈來愈慢。而且截至目前我們可以看到，這個過程是不會有終點的，所以只要我們的期望是依據現實的話，製定一個政治手段要考慮的，是事物的「改變」，而不是事物的「狀態」。我們的任務並非預留一個特別的社會型式，以及建立一個不可能的社會；我們的任務應是：「改變」會發生在一個沒有終點的「改變過程」裏，我們須要加强對這種實際的改變的控制，並且明智地運用這種控制。

獨裁體制吸收了「穩固」這個錯誤概念，方法上也作了同樣的錯誤假設，而傳統的科學觀點，正與它初無二致。波普反對，在政治上我們能够——更不要說應視爲目標了——去建立而且保存一個固定的社會型狀的說法，他也反對，科學能够——更不要說應視爲目標了——去建立而且保存固定的知識的說法。他反對這兩種說法的論證基礎，可以說步步都是一樣的。相對之下，他的觀點：「科學卽科學的方法」，「如何這個『方法』可以被明瞭」，和他的另一種觀點：「政治卽政治方法」，「如何這個『方法』可以被明瞭」，兩者之間是息息相關的。在這兩件事之中，波普要求我們運用感覺和想像力的，是一種無止境的「回饋」（feedback）過程；在這個過程裏，大膽、新的構想將可源源地被提出，而且在「經驗之光」轄治下，它們的錯誤，會降到最低的程度。在哲學上，波普稱呼這種辦法叫「批評的理性主義」，在政治上，他稱呼它做「點滴的社會工程說」，後者涵有三種不對勁的事：第一，「點滴」這個字眼不好，第二，方法上的根本改革，他加上了一個面具，這是更不利的；第三，當應用到人類時，「工程」有著教人不舒服的意含。這樣說來好像無情，其實，沒有比波普在維護它們時更熱情的了！也沒有比波普的論證，更符合人道的了！在嘗試充分展現波普的哲學時，這裏還是集中在他的「邏輯的論證」及其相關事物上。其實，更重要的是波普他道德方面的論證；提到這點，提到我們所沒有討論的，我便要建議諸君，自己去翻看波普所著的書了。（下）